

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

罗纳德·塔门 亚采克·库格勒

陈 琪 吴文成译

美国集中全部精力、时间和力量在伊拉克进行反恐战争和其他辅助性行动,这一行动虽有充分的理由,却会危及到它维持世界最强国地位的努力。导致这种短视行为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明显的安全威胁和危机感,同时也是由于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很难从长远着眼。因此,美国现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压力,这些压力正在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并威胁我们的战略利益。

“9·11”袭击和接下来在中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美国对外政策界产生了一种急迫感,危机感的加剧决定性地支配着我们,使我们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此。这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短期效益。比如,美国已经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过程中重新振作起来。但另一方面,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争论,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短期而不是长期的考虑上。现在 we 才开始理解这一军事行动的战略意义。^①

* 本文是作者向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于2005年3月1日—4日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会议论文,论文在本刊首发。

① Jacek Kugler, Ronald L. Tammen and Brian Efind, "Integrating Theory and Policy: Global Implications of War in Iraq,"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4, 2004.

《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总第3期),第1—20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这些全力解决国家当务之急的表象表明美国的战略思想已经变得僵化。一方面的原因是冷战一代的决策者无法对新世界做出预见,他们的核心理念不仅对于反恐战争,而且对保持美国领导权更广泛的努力都不再起作用。另一方面则是战略界智囊层面的失误,因为他们未能提供新的灼见、连贯的战略和关注的焦点。

注意力偏离主要方向以及思维上缺乏洞察力所导致的潜在后果非常严重:美国和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不是来自恐怖主义,甚至也不是来自地区性冲突。相反,这种挑战来自美国与日渐崛起的中国之间长期的利益冲突。理解这一事实将促使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从战略性角度,重新审视和分析当前的危机。中东、南亚和东亚所发生的事件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这些事件本身,而是因为当亚洲成为世界政治的焦点时,这些事件所体现出的对美国领导地位所构成的最终挑战意义。^①

一、维持国际稳定需要战略远见

世界权力结构图景本质上反映的是国际等级结构,各国领导人对此均心领神会。在过去,这种等级结构由民族国家构成,但在当今的全球背景下,它们也包括诸如公司、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这些拥有软权力的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这一全球等级结构是持续变动的,并反映了各国相对权力的变迁,而这种变迁是受各民族国家增长率差别和资本与生产资料跨国流动驱动的。在当今的世界等级结构中,美国的支配地位是不可挑战的。但是,美国的超强优势正相对衰落,并将在 20 到 40 年内最终丧失。^② 美国一直缺乏一项长期战略以及

① 本论文得益于包括罗纳德·塔门(Ronald L. Tammen,)、亚采克·库格勒(Jacek Kugler)、道格·莱姆基(Doug Lemke)、布赖恩·伊费德(Brian Efirid)以及赛德斯·斯瓦明赛安(Siddarth Swamingthan)等众多合作者的研究努力。他们的研究散见于 *Asian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和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等杂志上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这三家杂志是为 2003 年 8 月在加利福尼亚的卡梅尔(Camel)举办的权力转移会议而发表这些论文的。本文有关中国台湾形势的分析是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Chatham; Chatham House, 2000) 一书分析逻辑的延续,也是在罗纳德·塔门的一篇文章以及 2004 年他在台湾发表的一系列演讲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

②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Washington, D. C.; GPO, 2004);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将关键国家和利益有关的国家纳入美国领导下的满意国家联盟的计划,而这正是本文的关注核心。拥有这种长期战略事关重大,因为一旦出现对美国霸权危险的挑战,上述联盟将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虽然是惟一的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却不是一个全球霸权。美国只有通过召集并管理具有相同偏好的国家联盟,才能维持住自己的支配地位。在各自的地区之内,巴西、中国和印度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满足现状的国家接受体系内最强国所创建、领导并捍卫的规则,因为这些现状国可以分享由此带来的繁荣与和平。另外一些国家则挑战或拒绝现行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它们游离于这一领导联盟之外。

有时这些不满现状的国家变得足够强大,以至于能够挑战世界体系内超强国家的领导权。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将会爆发范围广泛、破坏严重的世界战争,并将重建全球等级结构。在地区等级结构下,成员国的外围之间也会演绎相似的进程。地区性战争改变了当地的权力分配并重组地区等级结构,今天的中东就明显如此。但是,地区性战争无法改变世界政治的结构。当前美国的战略思想恰恰失败于此。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的结果可能会改变恐怖主义的面貌和重塑中东地区的等级结构,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等级结构下各竞争者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确保美国的长期稳定。一项新的战略远见必须着眼于这个双重挑战。^①

全球稳定性是世界超强国对外政策的前提。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对世界坚定的领导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全球规制。这些根本性的制度结构促进但并不绝对地坚持民主、人权、出版自由和开放经济的发展。它们旨在消除激进因子,并帮助预防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独裁,无论这种独裁是由意识形态偏好所导致还是由宗教偏好所导致的。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领导主要是运用经济、金融、政治的激励方式,偶尔也运用很少能成功的制裁,以在利益上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在利益不能协调并且出现了威胁全球稳定的地方,美国便使用武力。由于武力的代价是高昂的,

^① 战略远的核心概念包括诸如权力变化、承诺维持现状、人口、生产效率和政治能力。对于决策者来说,作为权力组成部分的人口、生产效率和政治能力的变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为战争、和平与一体化预设了条件。走向战争还是进行政策一体化,部分是由国家之间的相对权力所驱使,部分是由在何种程度上遵从还是拒绝作为现状内容的规范和规则所驱使。虽然支配国不能有效地控制其他国家的增长率差异,但它的对外政策却可以影响其他国家是否满意等级结构下的现有规则。

它一般只作为最后的手段。

但是,一旦武力被有效地使用,它就会对世界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例如,自二战以来,美国以比一战后的英国更为成功的方式改变了国际体系,从而巩固了美国在 20 世纪的地位。美国的军事占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与经济系统的变革,促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相继转变成国际社会稳定而民主的一员,现在,德国是欧盟的领导者,日本是亚洲和亚洲之外主要的经济体。美国改变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政治偏好与政治目标,使之更加认同有利于美国领导下的全球等级结构的国际规范。冷战见证了同样的结局:苏联的挑战不是被意识形态或军事上的对抗所终结,而是因为苏联内部的破产导致了国家解体以及随后推行了开放的市场经济和初级的民主制度。经验证明,改变偏好是通往稳定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一个统一的战略架构可以为未来复杂的演化进程提供指南。这种架构将促使人们理解世界政治,因为它能让决策者对冲突与合作的不同阶段做出预见。了解了可能出现的威胁,就能够规划政策的轻重缓急并安排政策的出台时间。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一直缺乏这样的架构。本文力图在一种战略视角下,用能被经验检验的命题来勾勒未来世界政治蓝图,希望这仅仅是迈出的第一步。

二、权力转移的动力机制

下面以动力图的形式,将我们战略观点的所有关键变量诸如权力、等级结构、满意度、战争与和平的概率进行整合并相互关联起来。图-1 说明的是,在一个得到各国认可的超强国主宰国际等级结构的条件下三个关键性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上述用政策术语描述的理论框架中可以推导出很多结论,其中因其战略上的价值而尤为重要的结论是,当一个不满意的挑战国觉察到有机会夺取支配性的国际领导者地位时,世界性的战争就将爆发(图-1 中深色区域)。在权力分配均匀的条件下,和平与一体化(图-1 中浅色区域的区域)将会出现,但这需要主要的世界大国都接受支配世界政治的那一套规范和规则。由此观之,恰恰是因为美国将一套共同的民主制度强加于欧洲,迫使那里出现“自由”民主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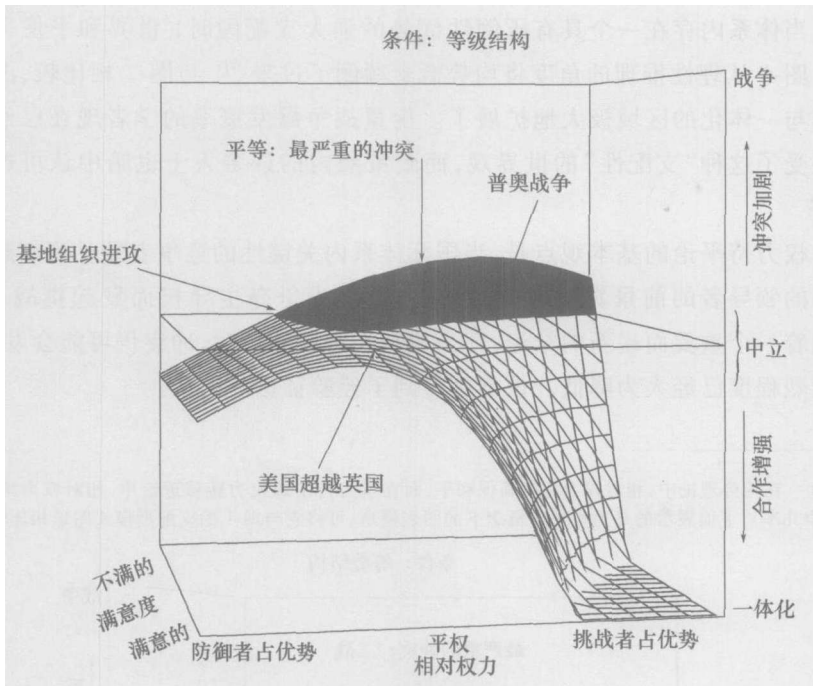


图-1 权力分配的动力学原理

二战后德国、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民主和平以及随后欧盟的演化才得以出现。所以，虽然欧洲国家的权力分配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况，但因为这些国家都接受了由美国创立的共同的制度与规范，所以欧洲实现了和平，并且一体化随之而来。苏联解体后，情况越来越明显，尽管形势的发展还很缓慢，所谓均势保证和平的理论主张已经愈加不符合国际体系的结构事实。^①

① 国际政治领域的很多分析人士尤其是美国的研究者，极力支持沃尔兹提出的均势确保和平的观点。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直接源自布罗迪(Brodie)提出的早期均势概念，之后因特利吉塔(Intriligator)和布里托(Brito)又对其加以引申。这些观点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的核平衡是漫长的冷战时期一直保持稳定的主要因素。苏联解体后，权力持平论、被称为权力转移的理论甚至霸权稳定论等视角则更贴近经验纪录。参见 Kenneth Waltz, "A Strategy for Rapid Deployment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5, No. 4, 1981, pp. 49—73; Bernard Brodie, *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 Co., 1946); Michael Intriligator and Dagobert Brito,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War," *Public Choice*, Vol. 17, No. 2, 1981, pp. 247—260;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of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Chatham: Chatham House, 2000);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当体系内存在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大支配国时，世界和平便得以维持。图-1 从理性推理的角度将均势概念颠倒了过来。^① 与图-2 相比较，图-1 中合作与一体化的区域极大地扩展了。衡量战争爆发概率的学者现在已经明确地接受了这种“支配性”的世界观，而政策圈内的许多人士也暗中认可这种观点。^②

权力持平论的基本观点是，当国际体系内关键性的竞争者预见到超越现行机制的领导者的前景真实存在时，它们便会为争夺主导权而发起挑战。图-1 蕴涵着一个重要而崭新的结论，即当权力失衡很明显时，冲突仍可能会发生，但其激烈程度已经大为降低。该推理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① 在均势理论中，相对权力均衡确保和平，而在权力持平或权力转移理论中，相对权力均衡增加了战争几率。下面展示的是力量平衡概念下的图表模型，可将它与图-1 的支配型模式图形相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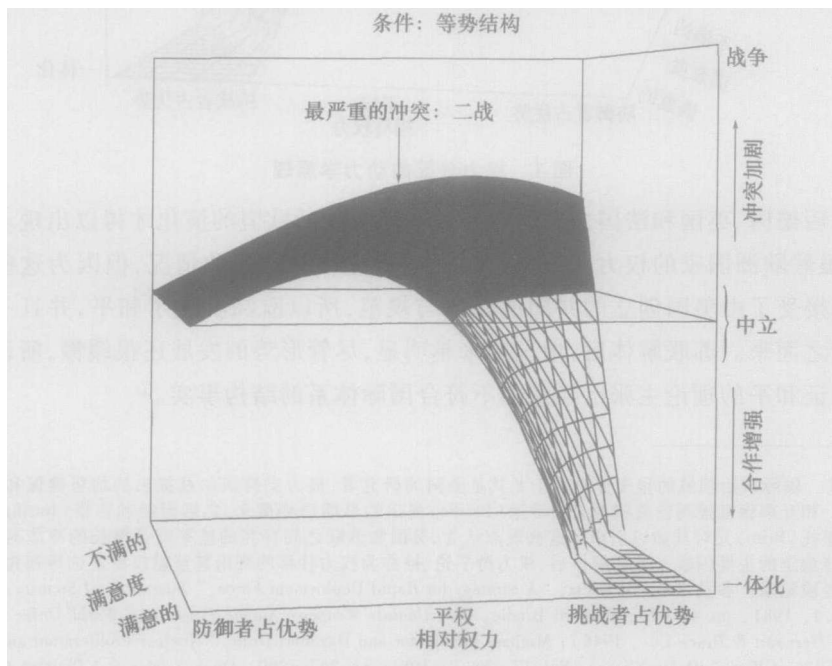


图-2 权力分配的动力学原理

②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of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当全球等级结构呈现均衡状态时,美国与其盟友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1945年之后,美国一跃而为世界超强国家。它继续在朝鲜、越南、科威特和伊拉克发动了战争。但与世界大战相比,这些战争只造成了有限伤亡,就仿佛“基地”组织(Al Qaeda)对美国发动袭击所造成的结果一样。尽管拥有超强的优势,美国仍然未能威慑住这些战争的爆发,不过这些战争带来的损失已大为减少。这种通过形式逻辑演绎而得的图示也可以解释布埃诺·德·梅斯基特(Bueno de Mesquita)和拉尔曼(Lalman)所发现的一个悖论: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爆发的“七周战争”恰好是处于权力持平阶段,但两国都愿意将这种竞争者之间的冲突保持在低水平状态。^①因此,权力持平条件下爆发冲突的几率是很高的,但受到满意程度限制的结构性束缚使战争烈度保持在有限的范围内。^②

对权力持平模型的新表述,也可以正式回应丘克瑞(Choucri)和诺斯(North)所提出的问题。^③他们认为,这种理论不能解释世界等级结构的支配权为何从英国和平地转移到美国这一事实。但是,就如图-1所展示的那样,两个主要强权之间实现权力和平更替的条件,包括双方都要遵从那些规范着等级结构的国际规则,并非像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有权力关系才会导致国家之间爆发冲突。国家的偏好是否一致以及它们与权力持平是否协调,决定了战争还是和平。^④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图-1所包含的出人意料且赋予政治战略内涵的寓意。在左下角底部,图-1解释了一体化的过程。一体化是二战后出现的最为重要的新现象。图-1与图-2的对比表明,在后超越时代的权力非对称时期,最有可能出现这一进程。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等人在1957年独立地观察到了这种新的关系类型。^⑤他指出,当出现各国权力持平时,一体化不会发生。相反,只有围绕着“力量中心”即某个为一体化提供核心的主导国,一体化才能实现。^⑥

①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War and Reas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就像一个政党内部的选举,两个对现状满意的国家也会爆发低烈度的战争。相反,如果与跨党派选举很相似,那么两个对现状不满意的国家之间就会发动残酷的全面战争。

③ Robert C. North and Nazli,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④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Norton, 2001).

⑤ K.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28—38.

⑥ 这一论点与布莱克的“中间投票人定理”的预测相一致:占有优势的政党将促使较小的组织加入一个更大的获胜联盟。

一个超强国控制下的等级结构增加了较小的挑战者们的冲突成本,而减少了一体化的成本,这样就形成了追求稳定的偏好。正如基欧汉(Keohane)所言,主导国需要维持现状。他正确地推断道,超强国有能力吸收一体化的代价,并能让较小的国家“搭便车”^①,其原因是它们的这些行动符合经济的稳定增长。在一个均衡的等级结构中(如图-2),爆发冲突并进而升级到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一体化的前景却降低了。任何一方都不愿承受一体化的负担,而等级结构中的每一个成员国都能通过避免支付集体物品的成本来加速各自的增长。因此,与其提供促进各国贸易扩张的机会,能够影响市场价格的大国不如纷纷设置关税,力图以这种自私的方法来推进本国的增长。^②

三、政策启示

权力持平为冲突与合作预设了结构性条件。虽然权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模型与权力持平(power parity)模型都以权力为中心进行理论演绎,但是各自提出的战争与和平的条件却大不相同。另外,它们籍由各自理论视角所提供的实际政策建议也是不同的。权力持平视角可以让竞争者们对战争或者和平的选择做出预见。如果存在长期的分歧,特别是涉及持久的领土纷争,那就创造了导致严重对抗的根本性条件。当双方权力实现了持平并且陷入不断扩大的分歧之中时,军备扩张和军备竞赛就成为竞争者们抛弃和平而选择战争的意愿信标。沃纳(Werner)和库格勒(Kugler)的文章表明,当这些条件具备时,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爆发了大规模战争。^③

上述研究结论政策上的启示是,必须认真评估权力持平时出现的战争风险,从而做出战略上的准备。动员国内资源、建立有效联盟、保持中立等措施都可用来适应政策的变化。在世界政治中要做出各种战略选择,就应该有一种可

①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Yi Feng,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ory, Data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Boston: MIT Press, 2003).

③ Jacek Kugler and Suzanne Werner, "Power Transition and Military Buildups: Resol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ms Buildups and War,"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Par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pp. 187—207.

靠的战略远见。这一点对于美国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关键性的决策将促使均势的天平向全球稳定或全球不稳定任意一端倾斜。

冲突研究的理论文献为权力持平模型的命题提供了许多支持性的经验证据。^①如果是在别的研究背景下,这些形式化和经验性的证据已足以挑战那种认为均势可以维持和平的基本命题。然而,鉴于美国政策圈和学术界普遍信奉均势理论的基本逻辑,这两种研究方向仍在并行发展。苏联的解体是一块关键性的“试金石”,它使人们感到有必要重新构建那些长期持有的观念。

今天没有人能说俄国对西方世界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或者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个产生同等威胁的挑战者。而且,苏联解体后,世界稳定性增加了。此外,美苏两国将核武器重新相互瞄准以及由此出现的核不对称局面,使相互确保摧毁能够继续保持国际体系稳定的论调难以令人信服。

① 奥根斯基(Organski)和库格勒利用西方主要大国之间爆发的大战记录,表明了权力持平与权力转移是1870到1970年间爆发大战的必要条件。同样地,武桑·金(Woosang Kim)、西卡玛(Siccama)以及布雷默(Bremer)和丘萨克(Cusack)也揭示出,权力持平与权力转移是最近两个世纪内国际体系中发生的最严重对抗所必备的条件。另外,沃纳和库格勒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考虑到所有旷日持久的危机都源于不断恶化的分歧,当挑战者的军事准备速度超过防卫者时,权力持平可以解释上两个世纪爆发的几乎所有的大国战争。见 Woosang Kim, "Power Parity, Dissatisfaction and War in East Asia 1860—1993,"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1996, pp. 654—671; Siccama et al., "A Two-Level Explanation of World War,"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of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Stuart Bremer and Thomas Cusack, *The Process of War: Advancing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War*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Jacek Kugler and Suzanne Werner, "Power Transition and Military Buildups: Resol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ms Buildups And War,"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of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pp. 187—207。

莱姆基(Lemke)对权力持平理论的视角作了重要的扩展。他证明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地区性领导大国。莱姆基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揭示了所有的严重冲突都发生在权力持平之后这一普遍现象。他对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这些差别巨大的地区进行了经验测试。结果表明,导致国际体系内主要大国爆发激烈冲突的条件也适用于关键地区的主要竞争者。参见 Douglas Lemke,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最后,布埃诺·德·梅斯基特和拉尔曼利用复杂的“有限理性”作为分析工具,从逻辑上证明恰恰是权力持平理论(而非均势理论)所辨识的冲突与和平条件,才与人们所知道的经验证据相符合。这种方法运用于核威慑理论得到的结果也表明,权力持平与二战后的战争行为是相吻合的,而相互确保摧毁从逻辑上来说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战略。因为当承受危险的意愿很高时,威慑可能会失效。扎噶瑞(Zagare)和基尔戈(Kilgour)在研究完美威慑(perfect deterrence)时,将这一观点进行了推广。他们指出,完美威慑不可能是完美的,它易于导致不稳定。见 Bueno de Mesquite et al., *War and Reason*; Jacek Kugler and Frank Zagare, *The Stability of Deterrence*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Frank Zagare and Mark Kilgour, *Perfect Deter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Frank Zagare, "Reconciling Rationality With Deterrence: A Re-Examination of The Logical Foundations of Deterrence Theor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6, No. 2, 2004。

四、经验启示:来自亚洲的挑战

将权力持平逻辑推广至亚洲,可以让我们判定哪些互动有可能升级成一场严重的对抗,甚至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虽然这些互动有潜在的危险,但并不意味着会走向冲突。它们也可以得到和平解决,尽管眼前看上去它们显得颇具威胁性。

下面的图-3展示了各主要国际竞争者从1950年一直外推到2070年的较之于美国的相对权力和国民收入。当挑战国拥有支配国80%的能力时,权力持平的条件便得到满足。当挑战国的能力超过支配国20%,也就是其自身成为支配国时,权力持平的条件便消失了。以前的研究强烈地暗示,当挑战国能成功地超越体系中的支配国,并超过其所在地区100%—120%时^①,这一阶段最为危险。在将注意力集中于亚洲地区之前,我们将依据结构性权力关系,详细考察一下全球情况。^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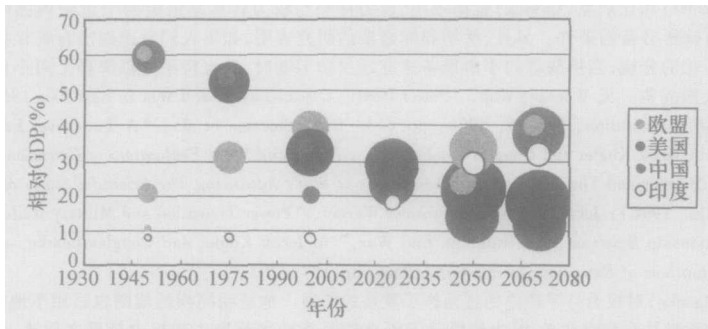


图-3 主要竞争者的相对权力和国民收入(1950—2070)

在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没有爆发为大多数分析家所极度担心的全球性的对抗,这一事实与权力持平的视角是完全吻合的。因为苏联从未能与美国实现权力持平,所以冷战没有演化成“热战”。在1945年到1989年间,苏联虽然进行了军备扩张和意识形态对抗,但它未能追平或超越美国的优势。进而,随着

^① Organski and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of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②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苏联的解体,超越更是遥不可及。这意味着,即使美国和苏联存在政策上的分歧,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接下来,我们考察一下美欧关系。欧洲将不大可能出现挑战美国的国家。任何一个单独的欧洲国家,诸如德国、英国、意大利或法国,都缺乏成为挑战者的足够资源。面积最大的德国甚至在重新统一后,其资源实力也只是接近日本而已。而从欧洲主要大国的人口基础来看,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口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超过美国,更无法挑战中国与印度,因此,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即便发生了这种对抗,这种冲突也不会很激烈。

欧盟也是如此。欧盟仍然不是一个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的统一的政治单元。但是,一旦欧盟严重疏远美国、北约解体、欧盟发展成为联邦制国家,那么美欧之间的冲突将是严重的。

因此,从我们的战略分析视角来看,对于美国安全来说,伊拉克战争的结果所具有的意义远不如它给美欧关系造成的影响重要。如果这场冲突继续分化西方联盟并影响北约的运作和欧盟的东扩,美国安全将面临一项根本性的挑战。如果分歧得到弥合,主要的损失只是失去了一次促进欧洲一体化,特别是吸收俄国加入西方联盟的机会。美国如果想在世纪的上半叶继续成为主要竞争者中的支配国,就必须与日本、俄国与欧盟建立坚强的联盟。来自亚洲的挑战也许不可避免,但它是能够被迟滞和更有效地加以管理,前提是拥有一个能够吸引俄国并将日本继续稳定在自己身边的西方联盟。^①对亚洲地区而言,这些结论也是有意义的。

五、中国的崛起

上面所勾勒的论点明确而清晰地将关注焦点投向了亚洲,特别是指向了中国。中国和美国不可避免地陷入争夺经济优势的长期性争夺中。身为当今较小的挑战者,中国正快速增长,其增长率比更为成熟的美国经济要高得多。这

^① Mark Andrew Abdollahian, *In Search of Structure: The Nonlinear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h. 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1996; Ronald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一动力正在为将来发生的超越创造条件。人们预期超越将发生在 2025 至 2035 年间(图-3 和 NIC 2004)。从我们的战略视角来看,这将中国置于能够与美国实现权力持平 and 潜在的权力转移的区间。我们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权力持平的条件下,如果双方都感到满意,和平便得以维持,但是,如果挑战者感到不满,战争的几率将急剧增加。¹

与美国同苏联的竞争不同,图-3 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将可能超过美国。如果这成为事实,考虑到其巨大的人口基数,由此导致的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持平就可能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如果中国的发展发挥了全部潜能,到 2075 年中国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国家。² 试以核武器为例。中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美国的核武库能确保在任何情况下毁灭中国,而中国只拥有最低核威慑。但是,在将来的某个时点,中国将达到与美国相互确保摧毁的相同水平。如果发生这种状况,潜在的对抗条件将会重新出现。情报部门和学界专家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³

权力持平视角提出的主要问题,不是中国能否在 21 世纪末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支配性国家,而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中国是公开挑战现存的国际规则,还是加入并领导业已存在的国际社会。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⁴ 20 世纪初,英国被美国所超越,它向美国和平地移交了世界领导权,且自那时起一直坚持与之合作的立场。另一方面,英国在 20 世纪早期被德国赶超之时,却被迫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以决定世界等级结构的支配权。仅仅是在从欧共体走向欧盟的过程中,政治态度发生改变的德国才和平地超越了英国。所以,挑战者对现状的满意是国际稳定的关键因素

¹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of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² 我们之所以不做出绝对化的结论,是因为考虑到这些观点:(1) 中国有可能像俄国一样从内部崩溃;(2) 中国将可能地方化,各省不再向中央上缴税收;(3) 中国自我破坏经济或者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而干扰目前的增长道路;(4) 中国可能实行民主化,从而成为民主和平命题的牺牲品。我们觉得,所有这些可能都不如我们上述主要结论站得住脚。

³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John Mearsheimer, "Why China's Rise Will Not Be Peaceful," *Mimeo*, 2004; Jacek Kugler and Ronald Tammen, "Regional Challenge: China's Rise to Power," in Jim Rolfe,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4).

⁴ 现实主义者特别是米尔斯海默从大国政治的悲剧逻辑出发,认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见 John Mearsheimer, "Why China's Rise Will Not Be Peaceful," *Mimeo*, 2004。

六、中国：满意还是不满意

我们理论和政策的论述重心都直接落在一个问题上,即现在和未来的中国是否是一个满意的国家。如果是它对现状满意,中国与任何地区性或全球性的竞争者爆发战争的几率将大幅降低。那么,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衡量满意及相应的不满意呢?我们会在下面的段落里提供一些初步的分析来回答该问题。

首先,基于我们对问题进行科学探究的立场,我们将考察一下领土争端所起的作用,它与不满意和战争息息相关。^①那么,中国与美国之间存有领土争端吗?

美国曾介入的与中国有领土含义的冲突活动的地方有三个:朝鲜、越南和台湾。^②中美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越南间接地扶植代理人进行战斗;围绕台湾爆发的冲突一直是间歇性的,时不时导致美国海军在此显示一下实力。在这一舞台上,被中国视为核心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就成为最具危险性的领土争端的实例。^③考虑到台湾问题所引发的周期性紧张气氛、中国逐渐增强

^① John A. Vasquez, *The War Puzz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aul .R Hensel, "Charting A Course to Conflict: Territorial Issues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1816—1992,"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15, No. 1, 1996, pp.43—73; Paul Huth, *Standing Your Groun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Michelle Benson, "The Ties That Binds: Status Quo Preferences, Democracy and Conflict," Ph. 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1999.

^② 不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冲突行为。

^③ 将来面临的是三个不同的方案。

方案1:台湾寻求“独立”。在此,时间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相信,台湾“独立”能得到美国的帮助又不会引起大陆军事打击的时机已经不存在了。不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台湾不可能在目前实现“独立”。然而,即使美国进行干预并且赢得仅局限于台湾的局部冲突,其长期后果也是严重的。在遭受军事损失之后,中国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一个长期对现状不满的国家。一旦中国实现了权力持平,爆发全球战争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加。长期来看,当中国的权力日渐增长并实现了对美国的权力平等之后,当前的联盟将会重新组织以应对美国支配地位的势微,台湾问题和平调解的可能性将减小。在这种方案之下,需要估计的危险是:一旦台湾宣布“独立”而遭到攻击,台湾在美国的盟友将迫使美国政府提供援助。这种估量是任何全球性博弈中赌注最高的,它需要以一系列不能提前预知的复杂假定为基础。

方案2:中国统一台湾。这种统一可能呈现“平静”和“演进”的方式。不论有无美国的参与,双方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协商促成这种合并。这种复杂的情况应该用什么术语来称呼,我们有些踌躇。但毫无疑问,必须要有某种可能是来自于外部机构(联合国或者地区安全复合体)不断强化的保证,以便在把对外政策权转让给北京后可以处理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自由问题及某些分担国家安全义务的长期安排。

方案3:继续维持现状。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引发的紧张形势及与之相随的不断出现危机的局面,极可能会继续维持下去。这将导致阶段性的紧张越来越加剧,也许将增加中国方面的挫折感。在中国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抬头。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中国在2020年到2050年间的某个时刻实现了对美权力持平,中国用胁迫手段将台湾重新统一的努力,将迫使美国在两种艰难的选择中决断。美国可以选择军事干预之外的办法来保护台湾,也可以履行用自己的军事力量保卫台湾岛的承诺。就前者而言,这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把优势地位交到中国手中;若选择了后者,这就预示着将爆发激烈的战争。

的军事力量、中国领导人发表的明确声明、台湾领导人的挑衅言论、民族主义抬头的迹象,以及北京、台北或华盛顿任何一方错误判断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围绕台湾问题爆发战争的前景。

第二,衡量不满意的一个可靠信标是双方之间的军备扩张。^①那么,中国与美国正在进行导致军备竞赛的军备扩张吗?

中国正在增加它的国防开支。现在,中国的国防开支可能排在美国、俄国之后而位列世界第三。情报部门估计,中国在下一个十年里会成为世界第二大军事生产国(NIC 2004)。^②中国的国防预算年均增长速度正在超过经济增长率,而且其大多数军事开支不纳入预算,即不在官方的预算文件中加以披露。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在面向台湾的南京地区集结了超过500枚的现代化弹道导弹;中国人还从俄国购买先进武器,并努力获得共同生产这些武器的许可证。这些购买计划包括苏霍伊战斗机、地对空导弹以及装载反舰导弹的潜艇。中国的造船厂正开足马力生产中国设计的新型驱逐舰。逐渐增加的证据表明,中国关注并重视精确制导武器、信息战和其他不对称战略。

这些是否构成了军备扩张?并不一定。中国大多数的军事单位仍然训练不足并且装备落后。中国毫不隐瞒最近的军事发展,其战略开始透明化:为在台湾或其周边地区遏制甚至在必要时打败美国而着力规划和部署军事力量。

而美国方面,防务开支也正不断增加,但这并不是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的结果。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短暂的下降后,美国的军事预算已经开始在增加。这些新增加的一部分开支,特别是反弹道导弹的部署,可能被中国视为试图阻止与美国实现相互确保摧毁之举。但是,美国军备扩张的大部分乃是为了直接应对“9·11”袭击和伊拉克威胁。美国用在对付恐怖主义和庇护恐怖主义行动的国家的国土防卫、特种部队、情报收集和常规武器上的花费,要远多于针对中国所用的花费。尽管美国军事开支有所增加,除了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美国声称,它是为防卫有限和偶然的导弹袭击而设计的),当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军备竞赛正在逼近。中国的反应也支持了没有爆发军备竞赛的观点。毫

^① Suzanne Werner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Military Buildups: Resol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ms Buildups and War."

^②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无疑问,只要中国愿意,它可以急剧增加其国防预算,但这将要以降低几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和引发工人不满为代价。

潜在的挑战者没有选择大幅度的军事扩张,这一事实表明美国面临与中国建立信任关系并将其进一步纳入满意国家阵营的重大机遇。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需要主动和目标明确的对外政策。克林顿任内的美国政府尽力让中国以堪称优惠的条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进程确立的原则是,中国不断增加的国际经济活动受到国际社会规范的管束。但是,这些有可能成功的创举没有稳定而合理地得到贯彻。“9·11”之前,美国间谍飞机引发的争议损害了外交活动;“9·11”之后,虽然与中国的关系得以稳定下来,但美国方面仍然没有制订出任何长期的计划。然而,时间正在流逝。

第三,中国是否对现行的国际规则不满?考虑到中国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日升,中国领导人将中国的上升描述为“和平崛起”。由于中国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对外政策,他们把中国描述为怀有善意的崛起中的巨人。在地区范围内,中国提出了许多双边和多边倡议。经济的发展已经让中国取代美国而成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最大出口市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经济中心,并因而进入多重的交错关系中。虽然中国加入地区性组织的动作一度缓慢,但现在它已有意愿加入亚洲区域内的经济和安全组织。在追求地区影响力的长期战略中,这体现了一种新的满意度和信心感。

在全球层次上,中国谨慎地挑选所要加入的国际组织。中国在2001年11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拒绝与旨在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扩散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进行全面合作。利比亚、巴基斯坦和朝鲜都有可能从中国秘密的武器扩散中获益。这些行动传达了美国领导下的现行国际规范抱有某种程度的不满。^①当问题来临时,中国领导人才缓慢地节制自己的武器扩散行为。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第四,中国与美国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争论?中国进行的伟大实验需要平衡政治控制与经济自由。政府灌输和强化的意识形态是以有限的个人自由为代价。这套意识形态信仰定期地发生剧变,但是,国家的强制机制和

^① 另外的解释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对现行的军控体制不满,而是因为不同官僚机构之间的斗争以及部分高层和军队的利益使然。

坚持执政党的至高性一直没有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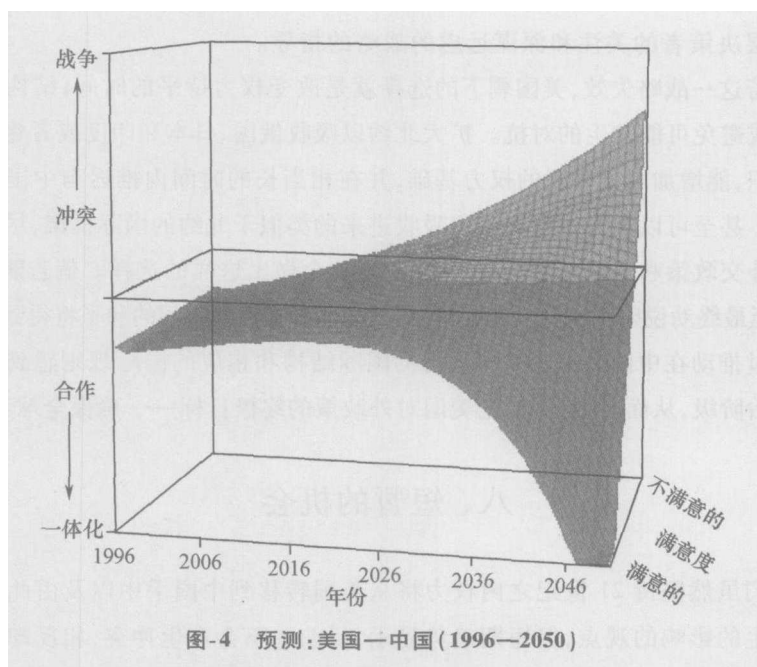
当然,个体在政治生活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两种意识形态体系对这个问题存在着分歧。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一些中国领导人感到西方素来轻视中国,中国曾被迫吞下西方一手制造的苦果的观念还很盛行,所有这些因素使画面变复杂了。这些反西方甚至是仇视外国人的态度兼之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的政治精英中产生了含混倾向。这种含混性可以让中国毫无矛盾地在合作与冲突之间来回选择。中国内部发展起能够代表商业阶层和市民社会的其他各阶层的利益集团,将可能成为改变国内偏好以远离民族主义并代之以全球视野的关键所在。如果这一转变得以实现,支持国际社会规范和规范的精英们将拥有立足之地,从而促使中国做出为既存的并在演化的国际规则所认可的调整。

第五,中国与美国之间是否存在有约束力的贸易与合作局面?把中国与美国绑在一起的经济纽带是牢固的。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现在信奉着某种程度的自由市场哲学,而这是西方思想的基础。另外,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在不断地强化。无论是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美国对中国保持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双边贸易赤字,还是中国留学生人数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位列第二(仅排在印度之后),都表明两国之间的经济纽带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双方都必须对彼此的经济问题表示关注。这种局面与冷战高潮时期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经济联系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苏美两国这两个对手之间只有极少的经济交往,因此双方的经济界精英很少有机会软化各自国家的对外政策。经济融合而引发合作的前景是光明的。

七、与中国对抗的前景

这里所辨识的条件显示,美中关系是处在我们认为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唯一的地缘政治区间之内。正如图-4所说明的那样,冲突的可能性真实存在,而且在21世纪中叶将显著上升。对于海峡两岸以及更广大的国际社会来说,单凭这一点就使得台湾形势变得极端重要。台湾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图-4显示,美国和中国仍可以在冲突、合作乃至一体化(如果决策者愿意



的话)当中做出选择。如果双方都不采取行动、任意一方向对方平静地让步或者通过协商订立协定,中国与美国也许能够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不论采用何种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增加中国发展成为现行国际规范约束下的全球大国的机会,从而可以避免军备竞赛、促进国际主义的发展、弱化民族主义、发展贸易和增进相互利益。所有这些变数都会受到政策运作的影响。

美国和有战略远见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引导中国克服在增长曲线的迅速攀升阶段所不断增加的痛苦;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权力膨胀。这要求避免出现致使中国变得不满意的局面。但是,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绥靖。相反,这项战略承认互惠、交错、自利而赋予约束性的纽带的重要性。它关注的议题将包括一系列的谈判,涉及专利权和知识产权、财政透明、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汇率控制、市场准入、对本国产品的补贴、合理的法律赔偿、国内外移民方式、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等等。这当中的许多问题也曾是美国与欧盟分歧的焦点,只不过美欧双方的经济生产率水平大体相当。至于中国,这些问题则会更尖锐,而且不得不在美国与中国的个体生产率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时候要加以解决。要成功地解决这个非常困难的任

须有高层决策者的关注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的指导。

倘若这一战略失效,美国剩下的选择就是改变权力持平的时间;结构变革能够推迟或避免可能发生的对抗。扩大北约以吸收俄国、日本和印度或者建立类似的新组织,能增加西方联盟的权力基础,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推迟与中国实现权力持平。甚至可以想像建立把中国吸收进来的类似于北约的国际框架,尽管鉴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地缘政治利益,它不大可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倘若能够劝说中国乃至最终劝说印度接受上述安排,那么全球范围内大国间的和平将得到保证。

通过推动在中国内部产生对现行的国际结构和相应的国际规则感到满意的精英统治阶级,从而实现 21 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确保全球和平。

八、短暂的机会

我们虽然坚持 21 世纪之内权力将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手中以及由此对美中关系产生的影响的观点,但短期趋势显示,目前并不会产生冲突,相反却可能是实现合作的独一无二的机会。这与人们的一种认知有关,即认为美国已经扩大了与所有其他国家的权力。各国专家们的分析为上述结论所提供的认知证据显示,美国的军事能力已经领先所有其他大国一代到两代,海湾战争、波黑战争、伊拉克战争就是证明。

先进的技术、新的军事策略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等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美国在军事能力方面拥有了几乎无法超越的领先地位,各国地面和空中力量的现状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评估。令人瞩目的不单是这种新一代军事能力中的某个因素,而是综合利用上述诸因素而带来的系统整合与协调。

海湾战争给中国以及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军事领导人留下的印象如果不是警惕的话,至少也是深刻的。这场战争显示了美国的实力,包括集结分散的盟军、快速组建一支势不可挡的地面部队、史无前例地运用空军力量的能力,以及凭借速度、欺诈和大规模机动力量迅速和压倒性地战胜一支经验丰富和规模庞大的军队(尽管被十年两伊战争所削弱)的军事行动计划等等。

没有多久,还是这批外国军事专家不得不去理解在波黑战争中所展示的革命性军事进展。在这里,美国一反所有流行的军事信条和经验,在没有地面力

量支援的情况下,发动了空中袭击,并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员和物资损失为代价,实现了全部战争目标。这一令人震惊的军事成就在外国战略规划者们中间引发了羡慕、恐惧和焦虑之情。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感情。美国又一次打破传统,不依赖传统的数量优势和旧的军事原则,而代之以战场资料透明、信息优势以及惊人的速度来进行战争。美国敢于试验、协调未验证的技术以及将军事力量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用的意愿,又一次让那些军事规划者感到震惊。

虽然不可能详细地了解北京如何理解这三场战争,但中国军事机构的反应还是有参考作用的。中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依靠自身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已经无法再在当今世界获得中国所需的战略利刃。不过,因为中国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虽然也许只是暂时的战略选择,把发展的重心放在经济而非军事上,这一点与在一战前后以及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选择如出一辙,所以中国军队现在必须重新评估自身的战略,并且以西方为借鉴来寻找自己的道路。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逐渐增加了对信息战和其他撒手锏等概念的兴趣与重视,他们希望藉此获得一个矫正失衡的平台。

我们发现正是这种对失衡的认知才是我们分析中最为重要的概念。我们相信这种失衡只是暂时的条件,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当中国发展了在战场上能够与美国一争高下的内部结构和军事技术时,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将再次加剧。当然,就目前而言,现在的世界感觉上与以前有所不同。美国展示的实力令人印象深刻,各国的战略家们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也将有更多的理由保持谨慎,我们相信,这提供了可为美国和中国所利用的很好的机会之窗。^①

九、结 论

从美国的观点来看,时间并不能带来更多有利的条件来应对来自中国和亚洲的日益临近的挑战。为了避免在21世纪中叶某个时刻可能爆发的冲突,美

^① 我们在其他文章里对此做了论述,认为现在台湾宣布“独立”已经太迟了。我们以前的分析表明,台湾的地位将随着美国与中国相对能力的改变而下降。参见 Ronald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国必须寻找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方法,从而使之接受现行的国际规范与规则。为此,就需要在中国内部发展起代表商业阶层和市民社会各种其他阶层的利益集团。但是,美国对中国商业阶层和当地的利益集团的任何支持行为,都会被视作蓄意干涉中国内政之举,从而使之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因此,这一战略不能依靠美国政府的行动;这些市民社会的各组成部分应该由不同的渠道一个接一个地发展起来,并且不能与美国的官方政策有任何联系。

中国愿意吸引四邻和参加地区性组织是启动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机会。美国以外的各方越是鼓励中国加入、参与以及领导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中国的现状偏好就越巩固。国际商业团体可在这一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已经喜欢上西方的商业模式,中国的法律和制度与共同的商业惯例协调越多,这些商业团体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也就会越大。不过,国际社会的责任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肩负国际使命的组织无论大小都能在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比如,它们可以将容忍多元思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地方自治以及世界公民责任这些观念带给中国。

现有的一些证据显示,中国的富裕省份已经融入到国际经济网络之中,中国政府开始对官员腐败和黑市经济采取矫正行动。西方的工商业团体正敦促中国政府统一商业法规并实施有效的补偿方案。大量的旅游者从世界各地蜂拥进入中国,也带来了颇具传染力的观念。中国网络力量也正发挥着独特的舆论监督作用。此外,中国出口的35%输往美国。作为软权力的西方文化的诱惑力也正影响着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从而一点点地在改变中国。倘若这些推动力量综合起来超过了正在涌动的民族主义,那么中国的精英就会把世界视为机遇而非障碍,战争的爆发几率从而降低。

但是,从等式的另一端来看,中国的平稳发展和从容着陆并非是确定无疑的。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要满足渴望国家快速发展的需要从而可能会造成经济过热;另一方面,他们要担心无法为数百万从农村涌向城市的民工提供工作岗位。在中国加入国际体制的过程中,如果政府的控制机制失败,尤其是台湾问题的困扰而带来的恐怖和挫折感将可能被导向美国。因此,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对中美双方都非常至关重要。如果中美不幸因为台湾问题而发生冲突和战争,那么世界将发现这种结果极端令人不安。

作者简介

罗纳德·塔门(Ronald L. Tammen)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马克·汉菲尔德政府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1965年在太平洋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66年和1975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著有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2000); *The Economics of Defense Spending* (1975); *MIRV and the Arms Race* (1973)。

电子信箱:tammen@pdx.edu

亚采克·库格勒(Jacek Kugler) 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问题研究协会主席(2004—2005),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编辑。1965年和1967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73年在密歇根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著有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2000); *Parity and War* (1996); *The Stability of Deterrence* (1987); *The War Ledger* (1980)。

电子信箱:Jacek.Kugler@cgu.edu

封永平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03级博士生。1999年和2002年在河北大学获文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afeng1989@163.com

徐进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4级博士研究生。1994年和2000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x-j04@mails.tsinghua.edu.cn

邹明皓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外交学专业2002级本科生。

电子信箱:pzyzmh@163.com

李彬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学教授。1985年和1988年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3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最新发表论文“China: A Crucial Bridge for the 2005 NPT Review Conference,” *Arms Control Today*, Jan./Feb. 2005;论著有《军备控制的理论与分析》(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电子信箱:libin@mail.tsinghua.edu.cn

陈昌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1997年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获学士学位;2003年在国防大学获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chchsh@pku.edu.cn

宋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译著有《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电子信箱:pkusongwei@yahoo.com.cn